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晚明《孝经》学研究

刘增光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晚明《孝经》学研究

刘增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孝经》学研究 / 刘增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7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 16 辑)
ISBN 978-7-5325-7543-5

I. ①晚… II. ①刘… III. ①家庭道德—中国—古代
②《孝经》—研究 IV. ①B82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4770 号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孝经》
诠释的转折与演进”(项目编号:13YJC720026)的结项成果。

责任编辑 黎大伟
技术编辑 富 强
装帧设计 王晓阳

晚明《孝经》学研究

刘增光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329,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543-5/B·893
定 价 98.00 元

中国哲学研究应当重视《孝经》学(代序)

彭永捷

刘增光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专攻《孝经》学,博士论文以晚明《孝经》学为研究对象,入学不久就定下选题,就读三年来孜孜不倦地收集、校读了大量一手文献,写就了近四十万字的学位论文。晚明《孝经》学涉及《孝经》今文学和古文学之争,又纠缠着理学内部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之争,这些争论相互交织,牵涉广泛,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增光矢志学问,敏求深思,对晚明《孝经》学诸家逐一辨析,厘清了其脉络,对晚明《孝经》学和晚明理学的研究皆有推进,对晚明《孝经》学的问题意识、学术源流、理论分野、思想流变均有清晰把握。增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借此谈谈对开展《孝经》学研究的几点粗浅看法。

《孝经》学研究本属于传统经学研究范畴,“中国哲学”研究者以往不怎么重视这一块。他们不仅不重视《孝经》学的研究,而且对于除《易经》以外的其他诸经,都不太重视。我们通过图书馆对诸经上架的分类,便可对此一目了然:《诗经》相关的书是放在文学类,《尚书》、三《礼》、《春秋》相关的书是放在历史类,只有《周易》是放在哲学类,理由是《周易》看起来富有哲理,更有“哲学味儿”,所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其他诸经似乎不怎么“哲学”,于是哲学对它们都不太重视。

为什么“中国哲学”研究会将《孝经》学纳入其学科范围？这和较早的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有关。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广泛讨论，揭示了使用产生于西方的哲学来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毫无警觉地将其成果视为中国自身思想传统的产物，会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一、掘断中国自身思想传统，使中国自身思想传承和创新的模式无以为继，即所谓“截断众流”。二、颠倒经学、子学地位，将吾国思想传统与思想历史中最重要之经学，置于从属、废弃地位，将子学上升至学术观察最重要部分，即学人所讥之“婢作夫人”。三、用哲学的语言、思维、问题来诠释中国古代思想，其有效性大有疑问，即“汉话胡说”。这些讨论已形成许多重要成果，我们在此不过多展开。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后合法性时代”，我们应如何开展“中国哲学”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这两个问题并非是一同一问题，却息息相关。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范型之一，但却不是普遍范型，中国传统思想不属于这一范型，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并非哲学传统的历史，因而，用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思想的传统，才会产生所谓“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我们绝不能把孔、孟、老、庄视为吃饱喝足没事干（闲暇）而从事于探求自然奥秘以满足好奇心的“爱智者”。这点是需要再度明确的。因为尽管许多人参加了前一阶段的讨论，他们却依然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哲学”在学科合法性上便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只是将之简单化地理解为：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法”，我们“中国哲学”应该有其“中国哲学”的“法”，我们“中国哲学”为什么要合西方哲学的“法”呢？虽然这样理解也能得出树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结论，但却没有在根源上明了问题之所在。

中国自身的思想，我们称之为“义理之学”也好，称之为“道术”也好，总归不是哲学。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味排斥哲学、拒绝哲学。

虽然我们自身的思想传统不是哲学这种类型的,或者说中国并没有一个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哲学传统,但哲学已经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一个用哲学来开展思想研究的学术传统,因而,如何恰当、合理地发扬这一新的传统,并使其更多结合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这应该是“中国哲学”研究应着力探索的一个方向,亦即“汉语哲学”的方向。笔者曾著文略述之,此不赘言。

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后合法性时代”,我们怎样开展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才是恰当的。当前国学学科还未能确立,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还未能能在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中广泛展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仍然还要依赖“中国哲学”这个学科,倚仗“中国哲学”研究者这支学术队伍。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名目下,我们一方面大力探索“汉语哲学”,让哲学说汉语,用汉语讲哲学,另一方面却恰恰要开展“去哲学化”的工作,解哲学之蔽。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受哲学的“毒害”太深,在研究中国自身思想的领域内,太过于把哲学当回事了,以至于为哲学所蔽,不清楚研究中国思想的目的和任务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如何才能去发展中国的思想。比如用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及阶级斗争史观去鉴定古代思想家的那一代学者,花费了半辈子的精力从事于斯,空耗了生命,所做的工作却并无太多学术意义。又比如,一些人执着于要把儒家学说发展成什么本体论、存在论,或者用康德哲学或现象学加工一下,认为这样就使儒学现代化了,把儒学“提升”到了某种高度。可是,对于儒学发展来说,这种加工工作并没有提升儒学,也没有直面儒学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而只是在学术上提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得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结论。加工者的本意是“提升”传统,“提升”儒学,在他们的骨子里,实际上视传统或者儒学为某种低级的东西,似乎儒学只有在他们用西方的哲学加工一

番之后才有价值。这不过是重新使用了黑格尔式的欧洲中心主义,把西方的哲学视作人类思想的最高形式。其实,只要破去哲学之障,儒学仍然可以借鉴哲学这种研究方式,哲学也仍然可以将儒学作为研究对象,但对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儒学既不必把自己装点得像哲学,也不是必须成为哲学,儒学的生命力在于运用其自身的智慧并汲取其他思想,创造性地回应当代问题,完成从传统儒学向当代儒学的飞越。其中,经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经学的意义在于重新把儒家经典置于载道之具的地位,重新在学术上确立儒家经典所承载的常道、义理,重新采取一种契合中国思想传统的治学方式和解经方式,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思想史的研究和当代思想的生产有机结合起来。经学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中国思想自身的话语系统,用中国思想的语言来言语中国思想,这是用“汉话汉说”来替代“汉语胡说”的可能途径。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仍然有不少人不愿意接受“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讨论形成的成果,他们仍然想延续从西方哲学学个把词汇来与中国思想史的史料附会并演绎一番的学科模式,并以此来继续“忽悠”、训练青年学子。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青年一代,应当尽早明了这些问题,避免把宝贵的学术生命浪费在无意义的工作上,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对于“中国哲学”这个学科,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些事情,却不应被它所限制。

关于《孝经》的研究,过去“中国哲学”学科关注比较少,只有伦理学界因为要讨论“孝”的问题,才会有一些关注。其实“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非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孝亲也不仅仅是一种美德,它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仁”是组织家庭、社会、国家的根本原则,“孝”是基于血缘的亲亲之仁最直接的体现,对“孝”的提倡与重视,根源在于对仁爱的推崇、培养和发扬。孔子“祖述尧舜”,《尚书》言上古政治独从尧、舜说起,并独称记载尧、舜

事迹的两篇为“典”，用意深刻。儒家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政治，孔子对圣王皆有推崇，但最推崇“明明扬于侧陋”的舜，舜是出于“问题家庭”却又事亲至孝的典范，以其道德与贤能成为尧的接班人，这体现了孔子对“选贤与能”的政治模式的崇尚。《论语》中记载，孔子弟子认为“孝”是“为仁之本”。《孝经》对“孝”在个人修养、家庭生活、国家政治中的作用都做了许多论述，《孝经》学则是围绕《孝经》所形成的思想史。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孝”的文化也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而这几个国家也恰被欧洲学者认定为人均智商最高的区域。在人类文明史和政治史上，用“孝”的文化来组织人群，把家庭、社会和国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无疑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高智商人群才能想出来的生活智慧，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汲取。破除了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对学术研究的限制，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孝经》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中可以研究和汲取的内容很多，可谓“海阔天空”。

刘增光博士在晚明《孝经》学领域已经做了有益的探索，也表现出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扎实功底和巨大潜力，希望他沿着《孝经》学研究这条道路不断探索下去，奉献更多的学术成果，也希望他作为新一代从事经学研究的学人，将古老的经学传统发扬光大。

2014年10月30日于北七家

.....

马克思主义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第二十六辑 (2014年8月)

.....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管理研究 吴新叶 著

.....

.....

博士文库 第十六辑 (2014年8月)

.....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于秋兰 著

新社会阶层的兴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实现路径 宋华忠 著

中国公共养老金体系研究:模式选择与改革路径 张熠 著

危险的分权:新工党治下英国的权利下放进程(1997—2010) 李冠杰 著

竹枝词发展史 孙杰 著

晚明《孝经》学研究 刘增光 著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设定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取径	8
一、文献学的方法	9
二、经典诠释学的方法	13
三、内在理路与外缘背景的二重分析法	16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本书内容	18
一、晚明《孝经》学文献的著录	18
二、晚明《孝经》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1
三、本书内容安排	33
第一章 《孝经》学史上的重要公案辨析	35
第一节 《孝经》的作者、时代与名义	35
一、《孝经》与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36
二、《孝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38
三、《孝经》之命名及名义	48
第二节 《孝经》今、古文问题梳理	52
一、汉代官方十八章本《孝经》和二十二章本《孝经》的 初现	53
二、汉代的《孝经》今、古文问题	55

三、今、古文《孝经》的文本问题	68
第三节 悬置今古纷争,探求《孝经》大旨——晚明《孝经》学	
关于《孝经》今古文问题的看法	82
一、虞淳熙之从今文说	84
二、孙本、朱鸿之从古文说	87
三、异中之同——《孝经》是孔子“孝治”之书	90
第二章 明代前期《孝经》学	94
第一节 明代《孝经》学著述与地域分布表	94
一、明代《孝经》学著述与地域分布表	95
二、简要的统计与分析	111
第二节 明代前期《孝经》学概况	118
一、今古文壁垒分明,互相攻驳不已	119
二、《孝经》为童习训蒙之书	120
三、将《孝经》和《忠经》并列的庸俗化倾向	123
四、理学化的《孝经》阐释	127
第三节 明代前期的《孝经》改本	135
一、朱熹的《孝经》学范式及其遗留问题	136
二、明代前期的几种《孝经》改本	142
第三章 疑朱而又尊朱——朱熹《孝经》学范式影响下的	
晚明《孝经》学	156
第一节 本性立教,因心成治——晚明《孝经》学对《孝经》宗旨的	
阐发	157
一、作为“孝治”大法的《孝经》	158
二、孙本对《孝经》为孔子论“孝治”之书的论证	160
第二节 晚明的《孝经》改本	169
一、朱鸿的《孝经》改本	172

二、沈淮的《孝经会通》改本	192
三、虞淳熙的《孝经述言》改本	198
四、杨起元的《孝经》改本	200
五、黄道周的《孝经》改本	201
第三节 《孝经》外传的编纂	205
第四节 对朱熹《孝经刊误》之反驳与清理	211
一、“圣言无有可议”——孙本《孝经释疑》对朱熹《孝经刊误》的 质疑	211
二、吕维祺对朱熹《孝经刊误》的彻底清理	216
第五节 从诠释学角度看晚明《孝经》学对朱熹《孝经》学的 反拨	220
一、独断型诠释与探究型诠释	221
二、“更好地”理解与“不同地”理解	224
 第四章 从良知学到《孝经》学——阳明学影响下的晚明《孝经》学	229
第一节 从《大学》到《孝经》——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孝论	230
第二节 朱鸿立本于良知学的《孝经》观	239
一、“本心之良”与“孝弟之实”	240
二、《孝经》为六经之总会	242
第三节 “孝弟为良知之实”——罗汝芳的“孝弟慈”之学与 《孝经宗旨》	244
一、以“求仁”为宗,以“孝弟慈”为实	245
二、从《大学》的“孝弟慈”之学到《孝经》学	248
三、《孝经宗旨》	256
第四节 良知学化的《孝经》学典范——晚明居士虞淳熙的 《孝经述言》	262
一、太虚、气化与鬼神——对张载“形溃反原”理论的	

借用	263
二、天心与仁心——对罗汝芳思想的接纳	266
三、“万物一体”义与斋戒工夫	273
四、孝即良知——以“孝”诠释良知	279
第五章 三教融汇思潮影响下的晚明《孝经》学	284
第一节 以孝弟、礼仪为中心看晚明的三教融合	285
第二节 云栖株宏的“孝戒为一”论及其影响	290
一、孝名为戒	291
二、孝名念佛	295
第三节 杨起元三教合一论域下的《诵孝经观》	298
一、杨起元三教合一的孝论	300
二、融合三教修养工夫的《诵孝经观》	309
第四节 杨起元的“戒自孝生”论	325
第五节 孝、礼结合——虞淳熙的《斋戒之目》	328
第六节 三教皆孕于孝——虞淳熙的《全孝图》	340
一、“太虚”与“孝”二元结构的宇宙生成一本体论	342
二、释、道二教亦在孝中	346
三、“忠孝一理”的《孝经》宗旨	348
第七节 晚明劝善运动与《孝经》学	351
第六章 余论：晚明《孝经》学的其他面向	358
第一节 晚明《孝经》学的道统观	359
一、传道即传孝：以“孝”为判准建构道统	359
二、学术与社会：晚明《孝经》学士人道统建构之二重原因	363
三、典范转移：与朱熹、王阳明之道统观的比较	367
第二节 和会朱陆、兼采汉宋的晚明《孝经》学	375
第三节 晚明《孝经》学与明代政治	386

第四节 从东亚的视角看晚明《孝经》学	393
结语	398
参考文献	402
后记	419

绪 论

本书拟对晚明士人关于《孝经》作者和文本的基本看法、晚明《孝经》学著述对《孝经》的诠释、晚明《孝经》学与晚明佛教孝论的比较、晚明《孝经》学与明代政治的互动等内容做主要分析,进而总结晚明《孝经》学在《孝经》注释和义理阐发方面的特点所在,从而在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大视域下,揭示晚明《孝经》学与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三教融汇思潮的内在联系。并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展现晚明思想与经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设定

本书所指“晚明”,遵从学界已有之界定,指的是从明穆宗隆庆朝以降至明朝彻底覆亡这一历史时期。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即言:“晚明时代……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 16 世纪的下半期以及 17 世纪的上半期。”^①这是将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四朝包

^①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含在内。^① 樊树志《晚明史》将晚明界定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② 不论哪一种分期法,都不会影响到本书对于晚明《孝经》学的界定。因为本研究所涉及的晚明《孝经》学著作,基本刊印、流通于万历年间及其后,研究所涉及的朱鸿、杨起元、虞淳熙、吕维祺、黄道周等人也主要活跃于这一时期,即使如朱鸿,其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但其《孝经总类》一书正是在万历年间他晚年时刊刻行世的。

此外,本研究也涉及到明世宗嘉靖年间的若干史实。这不仅由于晚明时期紧接着这一时期,也是因为嘉靖朝在明代历史发展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是明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盖自嘉靖朝之后,明王朝内外交困,日益走向衰败,而在思想理论、士风政风、政治礼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极大转变。尤其是,对明代中后期学术思想影响甚大的阳明学,正是在嘉靖年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万历年间获得了准官方学说的地位,^③故学界对晚明的研究亦多将其论述追溯于嘉靖年间。可以说,对嘉靖时期的研究是对晚明进行研究的必要前提。如嵇文甫即认为要研究晚明时代,“还得从明朝中叶王阳明的道学革新运动讲起”。^④ 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亦是将中晚明合而论之。邓志峰的《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的上编,也主要是讨论明代中期嘉靖年间的若干史实。更有学者将嘉靖末年也包含在晚明时期内。^⑤ 故而,本书的研究虽依嵇文甫之观点,将研究时段限定在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朝,但仍将就对这一时期的《孝经》学发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背景因素——嘉靖时期的明堂配享礼制改革与《孝经》之关系

① 明光宗在位时间过短,故忽略不计。

② 樊树志:《晚明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一书的相关论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④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页。

⑤ 参见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进行研究。非如此,则不能清晰地了解晚明《孝经》学发展繁盛之因。^①

晚明思想界是斑驳陆离、极为复杂的。甚至于要对其进行整体的归纳和总结,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即使是专为晚明的王学写史,都是很难的,博学如黄宗羲,其《明儒学案》亦不能做到精当无差。^②或许,这种复杂仅能通过诗意的语言来予以感性的描述。如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开篇所说:

(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出现实主义的曙光。^③

总之,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理想与现实交错的、极为复杂的过渡时代。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转折时期,即由宋明理学进至清代汉学的过渡阶段。欲对晚明时期的思想学术做一普遍意义的归纳和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达到此一目的,首先要以分析性的个案研究作为前提,例如,要对晚明时期的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做详细研究,也要对晚明时期的“四书”学、“五经”学做详细研究,

① 本书第六章对嘉靖礼制改革与晚明《孝经》学之关联作了分析。本书第二章对明代《孝经》学著述目录的分析也直观地显示出嘉靖时期的特殊性。

② 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朱维铮序,第1页。

③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1页。每谈及此,总会让笔者自然而然联想到狄更斯《双城记》的篇首引子:“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那是睿智开化的年月,那是混沌蒙昧的年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页。)当晚明《孝经》学士人在对本朝之以孝治天下进行歌颂时,似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的影子,而当他们回归现实,发现晚明礼法崩颓、朝纲紊乱的景象,这又是“最坏时代”的表征。